

消费与投资变动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

赵振全, 袁 锐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商学院)

摘要: 合理的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是经济发展保持全面协调可持续性的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消费、投资变动不同程度的影响着我国经济增长,并且这种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止的。为探讨其动态关联关系,本文运用可变参数模型分析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更进一步探讨了合理消费率与投资率^①,并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对今后经济运行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 经济增长; 消费; 投资; 可变参数模型

1 引言

经济增长是经济学研究的永恒主题,是指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衡量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规模、速度、结构、效益的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指标,是判断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和阶段、制定经济政策和评价政策效应的重要依据。GDP按支出法核算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部分。其中,消费和投资是我国GDP的核心部分,投资是总需求中最为动荡不定的领域,消费是总需求中最为直接的作用因素(多恩布什,2000)。在投资需求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方面,国外学者做了较多的工作,已经发现美国等国的固定资本形成(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所占份额)同人均GDP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一般情况下物质资本投资可以促进经济增长(DeLong & Summers, 1992; Chaudhri & Wilson, 1997)。Orazio等(2001)以欧盟一些国家1965—1995年数据为样本的分析却显示,经济增长可强烈地刺激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而投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负。当然,也有研究结果显示,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独立,没有任何因果关系(Lutz, 1999; Harris & Vally, 2000)。国内一些学者也做了很多相关研究,大多数是定性分析,吴忠群(2002)对我国消费和投资现状进行了分析,通过定性分析提出合理的消费率和投资率。贺铿(2006)通过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和国际间比较,得到关于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判断标准,并给出我国消费和投资的合理比例。战明华等(2006)认为,资本边际产出的非递减特征与渐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是保证中国高投资、低消费条件下仍可保持经济长期平稳增长的两个必要条件,而更新改造投资、非国有与集体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以及政府的非消费性支出都是导致资本边际产出非递减的因素。长期以来,投资和消费的变动都是影响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并且成为调节宏观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我国目前处于制度转型且高速增长的阶段,合理控制消费和投资比率是目前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消费是启动内需的关键,二者之间的平衡成为经济增长能否取得持续、协调、快速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国消费与投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重大冲击下,研究如何将刺激消费与投资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我国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结合起来,将使我国在应对金融危机的同时完成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这对保持我国经济较快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本文中如不做特殊说明,投资率和消费率分别指资本形成率和最终消费率

消费率、投资率、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都是一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指标，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一国消费和投资的情况。消费率和投资率用来刻画消费和投资所占 GDP 的比例，消费率（投资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 年）最终消费（总投资）占当年 GDP 的比率，它是反映了一个国家国民经济中消费（投资）比重的重要指标。而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则能较好的刻画消费与投资的增长趋势，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是经济运行的重要指标，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是消费（投资）增长额与前期消费（投资）总额的比率。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消费和投资总体上不断增长的趋势，通过消费率和投资率纵向比较能够得到我国消费和投资的比率变化特征，而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能够更好描述这种总体增长趋势。本文通过分析消费率和投资率的变化，论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消费投资比例关系变化特征，并通过实证研究讨论我国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最后探讨合理消费率和投资率的问题，并对今后宏观经济运行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2 我国消费与投资比例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GDP 从 1978 年的 3605.6 万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261770.1 万亿元，增长了 72.6 倍，资本形成总额从 1978 年的 1377.9 万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110250.8 万亿元，增长了 80 倍，最终消费支出从 1978 年的 2239.1 万亿元增长到 2007 年的 128332 万亿元，增长了 57.3 倍。若保持高速增长，投资与消费的比例一定要适当，也就是说消费率和投资率要与经济发展保持着协调的关系。近年来我国低消费、高投资是我国经济运行的常态（罗云毅，2004），高投资率、投资拉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主旋律（吴忠群.2002），然而，当投资率高到超过经济剩余能力（所谓剩余能力，即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满足扩大再生产需要追加的投资品和消费品的数量及其结构），就会出现供需结构失衡，影响社会再生产过程顺利进行（贺铿，2006）。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我国经济运行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鉴于改革开放前后经济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运行情况对我国以后经济发展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同时也考虑排除 2008 年开始显现的金融危机影响，因此，本文主要利用 1978-2007 年的基本数据（表 1）对近 30 年来我国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分析。从表 1 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明显变化趋势：我国消费率具有明显下降趋势，而投资率则有明显的上升态势。消费率从最高的 1981 年 67.1% 降到 2007 年 49%。在“六五”至“十五”期间我国平均消费率分别为

表 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GDP 增长率、消费率和投资率^①

年份	GDP 增长率	消费率	投资率	年份	GDP 增长率	消费率	投资率
1978	11.7	62.1%	38.2%	1993	14.0%	59.3%	42.6%
1979	7.6%	64.4%	36.1%	1994	13.1%	58.2%	40.5%
1980	7.8%	65.5%	34.8%	1995	10.9%	58.1%	40.3%
1981	5.3%	67.1%	32.5%	1996	10.0%	59.2%	38.8%
1982	9.0%	66.5%	31.9%	1997	9.3%	59.0%	36.7%
1983	10.9%	66.4%	32.8%	1998	7.8%	59.6%	36.2%
1984	15.2%	65.8%	34.1%	1999	7.6%	61.2%	36.2%
1985	13.5%	66.0%	38.1%	2000	8.4%	62.3%	35.3%
1986	8.9%	64.9%	37.5%	2001	8.3%	61.4%	36.5%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本文实证所用数据也均通过《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整理得来。

1987	11.6%	63.6%	36.3%	2002	9.1%	60.0%	37.9%
1988	11.3%	63.9%	37.0%	2003	10.0%	56.8%	41.0%
1989	4.1%	64.5%	36.6%	2004	10.1%	54.3%	43.2%
1990	3.8%	62.5%	34.9%	2005	10.2%	51.8%	42.7%
1991	9.2%	62.4%	34.8%	2006	11.6%	49.9%	42.6%
1992	14.2%	62.4%	36.6%	2007	11.9%	49.0%	42.1%

66.4%、63.9%、60.1%、60.3%、56.8%，除了“九五”期间消费率略有提高外，我国消费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则从最低的1982年的31.9%上升到2007年的42.1%。投资率在“六五”至“十五”期间分别为33.9%、36.5%、39%、37%、40.2%，五个五年计划投资率的变动和消费率变动趋势恰好相反，投资率总体呈上升的趋势，投资率由“六五”期间的33.9%上升到“十五”期间的40.2%。在“六五”期间，我国处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时期，我国消费率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值，平均消费率达到66.4%，投资率也处于近年来最小值，平均年投资率为33.9%，这段时间，我国经济面临巨大的通货膨胀压力，存在着供不应求的局面，由于处于计划经济，存在着严格的价格管制，价格上升趋势的真实程度被隐蔽，因此，此时的通货膨胀按成因划分属于需求拉动型，按市场机制的运行状况划分属于隐蔽型通货膨胀。随后的几年里1986~1992年，我国处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时期，我国消费率有所下降，投资率上升，在此期间，虽然我国经济由公开型通货膨胀发展到市场疲软，仍可以看到供求差距缩小，供不应求的现象也很少出现。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经济增长又经历了几次大的波动，每次波动都与消费和投资的比例不协调有着密切的关系。1992~1995年，这一阶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随之而来的是愈演愈烈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增长的快车道。由于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扩张过猛与金融持续的混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期间通货膨胀最严重的1994年通货膨胀率一度超过20%。1996~1999年，鉴于前一阶段经济过热带带来的影响，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于1996年实现经济增长的“软着陆”，这阶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降低，同时，市场开始出现疲软，开始出现通货紧缩，物价下滑，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均不振。十五期间，在价格转暖、民间投资意愿提升，出口快速增长、外资大量流入等一系列激励投资的因素叠加作用下，加上金融政策、土地政策的相对宽松和地方政府的行政推动等作用，造成投资迅猛增长。与此同时，我国的消费需求持续低迷。导致投资率持续攀升，消费率持续下降。进入2006年以来，我国经济仍然保持着快速增长的势头，GDP同比分别增长11.6%、11.9%，投资率均高于40%，而消费率持续降低，并且连续两年低于50%。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消费和投资的变动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的运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通过消费率和投资率来判断经济运行情况。同时，我们也知道，消费率有明显的下降趋势，投资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而GDP增长率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为了检验消费率和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因为投资率与消费率相互挤占，并且存在此消彼长的数量关系（吴忠群，2002），故本文主要考察GDP增长率与投资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见表2）。

表2 投资率（ I ）和经济增长率（ δGDP ）之间的Granger因果检验

原假设	F 统计量	概率
I 非 Granger 影响 δGDP	0.380	0.820
δGDP 非 Granger 影响 I	6.290	0.003

结果表明,我国投资率发生变化不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而经济增长导致资本形成,存在着实际产出对投资需求的反向影响关系。

3 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是从最终使用的角度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最终成果的一种方法,包括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部分。消费和投资是 GDP 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的变动必然导致 GDP 发生变化,而且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能够更好的反映消费和投资的趋势。为了定量的研究我国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首先基于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是平稳序列^①,以我国 GDP 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 1979~2007 年统计数据,建立了如下回归方程:

$$\delta GDP = 3.97 + 0.38\delta C + 0.23\delta I \quad (1)$$

(4.88) (4.28) (6.48)

其中 δGDP 代表实际 GDP 增长率, δC 代表实际消费增长率, δI 代表实际投资增长率。方程 $R^2=0.77$, 模型拟合效果较好, D.W.值为 1.51。从方程中,可以得出消费增长率提高 1%,可使 GDP 增长率提高 0.38%,投资增长率提高 1%,可使 GDP 增长率提高 0.23%。显然,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提高消费增长率会比提高投资增长率更有利于 GDP 的增长,也就是说,消费增长率与投资增长率对 GDP 增长都有很明显的拉动能力,但是相比较而言,消费增长率对 GDP 增长的拉动能力更大。近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一直较高,投资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然而我国消费水平却一直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因此,对经济增长而言,提高消费增长率会比提高投资增长率有更好的效果。

上面采用的是 OLS 固定参数的方法来估计参数,这时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是固定的,不随时间变化的,得到的是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与 GDP 增长率的平均影响关系。然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改革、各种各样的外界冲击和政策变化等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用常规的固定参数方法往往不能体现出经济结构的变化,因此,本文利用状态空间模型构造可变参数模型(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来研究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在不同时点上对 GDP 增长率的动态影响。

可变参数模型

利用状态空间模型(Harvey, 1989; Hamilton, 1994)构造可变参数模型,表示为:

$$\text{量测方程: } y_t = x_t \beta_t + z_t \gamma + u_t, \quad t = 1, 2, \dots, T \quad (2)$$

$$\text{状态方程: } \beta_t = \varphi \beta_{t-1} + \varepsilon_t \quad (3)$$

$$(u_t, \varepsilon_t)' \sim N \left(\begin{pmatrix} 0 \\ 0 \end{pmatrix}, \begin{pmatrix} \sigma^2 & 0 \\ 0 & Q \end{pmatrix} \right), \quad t = 1, 2, \dots, T \quad (4)$$

其中 y_t 是被解释变量, u_t 是扰动项, z_t 是具有固定参数的解释变量矩阵, γ 是固定参数, x_t 是具有可变参数的解释变量向量, β_t 是随时间改变的可变参数,是不可观测变量,必须用可观测变量

^①已对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在 95%的置信区间下,所有变量水平序列均是平稳序列。

y_t 和 x_t 来估计，体现了解释变量对因变量影响关系的改变，假定变参数 β_t 由 AR (1) 描述，并且 u_t 和 ε_t 是相互独立的，服从均值为 0，方差为 σ^2 和协方差矩阵为 Q 的正态分布。

本文仍以我国 GDP 增长率作为被解释变量，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 1979~2007 年统计数据建立了 GDP 增长率的状态空间模型，得到如下结果：

$$\delta GDP = 3.64 + \beta_{Ct} \delta C + \beta_{It} \delta I \quad (5)$$

(2.937)

$$\beta_{Ct} = 1.015 \beta_{Ct-1} \quad (6)$$

(59.13)

$$\beta_{It} = 0.988 \beta_{It-1} \quad (7)$$

(13.67)

改革开放至今，我国消费增长率（或投资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带动经济的增长也在发生变化，本文将这种变化称为消费增长率（或投资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 β_{Ct} （或 β_{It} ），或者叫做拉动潜力。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同消费率，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同资产形成率，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分别比较并画出相应的曲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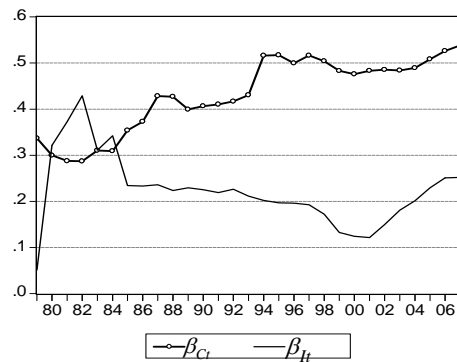


图 1 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 β_{Ct} 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 β_{I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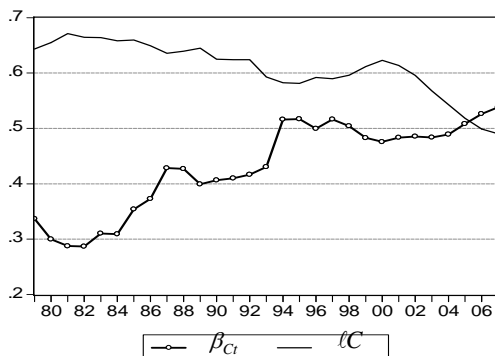


图 2 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 β_{Ct} 和消费率 l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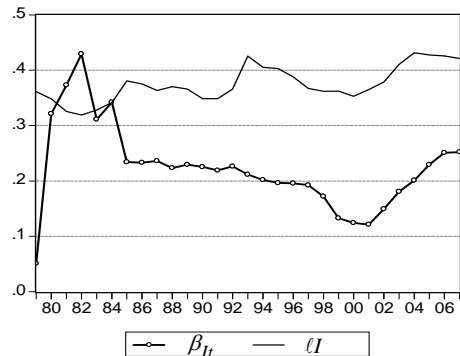


图 3 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 β_{It} 和投资率 lI

结合图 1、图 2、图 3 可以对消费增长率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的变化进行分析：

1、从图中可以看到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我国消费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系数有着明显的上升趋势，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则有着下降的趋势；二是无论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还是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分别与其相对应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几乎呈同步反向变化。

2、进一步分阶段讨论，在 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当时消费率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但仍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这一阶段我国消费增长率的拉动能力处于上升的阶段，同时几乎与消费率呈同步反向变化。投资率在这一段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同时伴随有先降后升的趋势，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则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并且有先升后降的趋势。

3、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在 1993、1994 年附近达到局部的最高点，消费增长率拉动能力最大，消费率也处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对的最低点。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也在同期处于 20 世纪 90 年代相对最低点，而投资率明显处于这一阶段的最高点。

我国当时正处于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发展的时期，投资率高、消费率低是这一阶段的特征，因此消费增长的拉动能力相对较强，拉动系数相对较大，同理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相对较小。1998 年以后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渐渐平稳，基本维持在 0.5 水平附近，处于稳中略升状态，而消费率则呈现下降趋势，在此期间，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曲线同投资率均呈现上升的趋势，说明这一阶段投资效率相对较高。这一阶段，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相对成熟，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和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相对稳定，但仍可看出，我国消费增长率拉动系数要大于投资增长率拉动系数。

由以上分析，现阶段我国提高消费增长率拉动经济增长效果较好，而提高投资增长率效果较弱。

4 关于合理消费率和投资率的探讨及相关政策建议

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最优经济增长时期，消费和资本积累的比例分配是最优的。不同的国家由于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消费和资本积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最优比例关系。国际经验表明，一国最终消费率保持在 60% 以上是普遍的，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当一个国家最终消费率长期低于 60%，就应该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我国最终消费率近几年来一直在低于 60% 水平下运行，而投资率在 40% 水平上下波动，这无论是与世界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平均值还是与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的标准值相比，我国消费率都明显偏低，而投资率明显偏高。目前，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合理比例的确定，既要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同时还要根据我国的国情、经济发展的特点，适时调整我国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的比例关系，以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最优的增长路径发展。

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我国合理的最终消费率和资本形成率的确定。吴忠群（2002）通过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运行结果结合着消费率和投资率变化，分析出当我国消费率为 61%~65%，投资率为 35%~38% 时，经济一般处于良性运行区间。贺铿（2006）通过历史比较、国际比较和投资效率分析结果得出，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合理区间分别为 [60%，65%]，[30%，35%]。关于我国合理消费率和投资率的确定，本文认为，（1）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国际比较。与世界一般水平，我国当前确实存在着消费率较低、投资率较高的局面，然而不能简单的认为这种“偏低”“偏高”是不正常的，任何一种比例关系、任何一种调控政策总是与一定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因此研究我国消费率和投资率比例关系，应该结合我国国情、社会、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经济因素进行综合研究。（2）消费率和投资率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合理区间。由上面所做的实证分析，我们了解到，我国消费增长率的拉动系数是时变的，因而消费需求缺口大小也在不断变化，相同的消费率水平下，消费增长率的拉动系数可能不同，故消费需求缺口可能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不能判断消费率

和投资率合理的固定区间，也就是说，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需要不同的消费投资比例。

综上所述，我国目前的确存在着消费率高、投资率低的局面，应通过对消费增长率、投资增长率的调控，使经济在正常轨道上运行，得到合理的消费率和投资率。当前，我国经济增长较快，然而这种快速增长是在能源消耗大、产业附加值低、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粗放式增长。80年代国内30%左右的固定资产投资率可以实现10%以上的经济增长，而到了2003-2004年为实现10%的经济增长，需要的固定资产投资比率在42.1%—43.6%。由于宏观投资收益下降，实现同样增长必须依赖更高的投资比率。但投资率不可能无限增长，受收入增长及储蓄率的限制，投资率存在上限。理论及实践结果预示：虽然一定时期内，我国仍需要高投资拉动经济，但长远看，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无法回避。而且，根据文中实证分析结果，我国的消费增长率拉动能力较强，因此，适当的提高消费、优化投资是我国目前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提高消费、改善投资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将应对金融危机与我国消费和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结合起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为应对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重大冲击，我国政府已出台一系列重大应对措施，其核心是刺激消费与投资，目前已经初见成效，总体看关于刺激投资的政策显得更多，本文认为在进一步出台刺激投资政策的同时，应适时注意出台相应的刺激消费政策，将我国消费与投资结构的合理调整与应对金融危机结合起来，使我国在平稳走出金融危机影响的同时也能使我国的消费与投资结构更趋于合理，促进我国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

（二）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有力地控制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提高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

一般来讲，低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高于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近年来不断扩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是形成低消费率的重要原因之一。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国际警戒水平，贫富差距正在加大。从短期消费函数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在收入分配政策方面，要理顺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二次分配的关系；在财政和税收政策方面，要通过加大公共财政支出建立良好的消费环境，通过税收调节，促进收入的相对公平分配，通过提高消费倾向高的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提高消费率。

（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完善的保障制度能够使人们对未来形成良好的预期，从而减少储蓄，增加当期消费。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仍不完善，居民预防性储蓄增加，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因此要加大对社保基金的资金支持力度，深化社保制度改革。当前应重点建立健全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医疗等农村社保体系，妥善解决进城农民工社保问题。要把增加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投资和供给政策落到实处；积极稳步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根本上缓解居民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四）改善消费环境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应该大力培育和发展消费热点，如住房消费、汽车消费、旅游消费、信息消费、网络消费、文化教育消费，同时引导企业调整投向，增加面向中低收入群体的商品供给体系。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发展消费信贷，改善消费环境。通过立法和行政手段，严惩各种商业欺诈及侵犯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使消费者能够放心消费。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降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支持有利于提高产业技术水平、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加强薄弱环节的行业投资与建设，积极推进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方式的

转变。加强对新农村建设、文教卫生、服务业等薄弱环节的引导力度，从而达到控制投资增长、改善投资结构、提高投资效率的目的。

消费和投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在实践中继续努力探求最适合经济发展的消费投资比例，通过合理改变消费和投资的力度，使我国经济沿着最优的经济发展路径运行。

参考文献

- [1] 贺铿：中国投资、消费比例与经济发展政策，《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年5期
- [2] 刘金全，于惠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经济增长之间影响关系的实证分析，《统计研究》2002年1期
- [3] 王金明，高铁梅：利用可变参数模型估算中国开放经济乘数，《世界经济》2004年7期
- [4] 吴忠群：中国经济增长中消费和投资的确定，《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3期
- [5] 战明华，许月丽，宋洋：转轨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条件及其转换路径：中国高投资、低消费经济增长模式的一个解释框架，《世界经济》2006年8期
- [6] 多恩布什、费希尔、斯塔兹：宏观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 [7] Chaudhri, D. P. and Wilson, E. Saving, investment,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growth of Australia 1861-1990 :some explorations[J].Economic Record. 76, 2000,pp55-73
- [8] De Long, J. Bradford and Lawrence H. Summers. How strongly do developing economies benefit from equipment invest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2, 1993, pp395-415
- [9] Harris Dellas and Vally Koubi. Industrial Employment, Investment Equi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2000 (Working Paper)
- [10] Lutz Hendricks.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 1999(Working Paper)
- [11] Orazio P. Attanasio, Lucio Pici and Autonello E. Scorcu. Saving Growth and Investment: Microeconomic Analysis Using a Panel of Countries[J].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82(2),2001,pp182-211

Abstract: A reasonable proportion of consumption to investment is an important factor to keep economy developing in a coordinated and sustainable wa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changes of consumption and investment affect economic growth in varying degrees, and this relationship is dynamic, not fixed. We research the dynamics of their relationship by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and analyze consumption growth, investment growth dynamically affect economic growth. Then, research the reasonable rate of investment and consumption, and put forward reasonable suggestions abou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future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Key words: Economic Growth ; Consumption; Investment; Time-varying Parameter Model

基金项目: 本文得到 08 年教育部重大项目 (08JJD790153)、07 年教育部重大项目 (07JJD790131)、“吉林大学 ‘985 工程’ 项目” 经济分析与预测创新基地资助。